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左玉河◎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左玉河◎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暗杀：义烈千秋的壮举 / 左玉河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1

(百年寻梦丛书/陈铁健主编)

ISBN 978-7-5317-2596-1

I. ①暗… II. ①左… III. ①政治事件-史料-
中国-1901~1911 IV. ①K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60650 号

暗杀

义烈千秋的壮举

.....
责任编辑 / 宋玉成

封面设计 /  品牌设计 · 小戚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20×1020 1/16

印 张 / 15

字 数 / 246 千

版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9.8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596-1
.....

导 言

提起暗杀，人们自然会想到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笔下的豫让、聂政，会想到刺杀秦王嬴政未遂而死的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种慷慨悲歌的壮烈场面，令多少英雄豪杰心仪神往，激励着多少热血志士勇往直前。

先秦时代的刺杀义举，铸就了中国古代的侠客精神。

不畏强暴，矢志不渝，敢于牺牲，为了道义而孤注一掷，不惜抛弃项上大好头颅，其气壮山河之举，义薄云霄之概，真乃民族精神之体现。

暗杀是一种手段，本身无所谓正误优劣，但暗杀行为的确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为了人间的正义和公理，铲除邪恶，仗义扶危，除暴安良，匡扶人道，挺起三尺龙泉剑，刺杀奸臣佞人，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这样的刺杀，就是正义的刺杀，是值得称赞和鼓励的义举。

相反，则是非正义的暗杀，是对人类真善美的亵渎，是对人间正义的毁灭。非正义的暗杀，是必定要受到正义和良知谴责的。

暗杀可分为政治暗杀与个人谋杀两种。个人之间因私人恩怨而产生矛盾，因恩怨而引发仇恨，为泄私愤而进行暗杀，是个人暗杀；个人及家族因蒙冤而复仇，因复仇而进行刺杀，同样也是个人暗杀。个人之间的暗杀，冤冤相报，仇杀不已。血淋淋的杀戮背后，是人性的丑恶，是良知的泯灭。这种个人谋杀，尽管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是有意义的举动，因而并不值得提倡和效法。

政治暗杀，是政治集团之间为了争夺权力而采取的一种斗争手段。它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当博弈的政治势力之间力量不对称，矛盾无法调和并且弱势者处于激进状态之时，就会选择政治暗杀。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方式，暗杀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各种矛盾激化到了一定阶段，政治暗杀就会成为矛盾的爆发点，同时也成为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式，一种极端的

解决方式。通过这种极端手段，一些矛盾更加激化，或者说处于临界状态，矛盾也可能发生重大转变，政治暗杀的作用就在这里。当一般民众不能决定国家前途的时候，各方政治集团就会通过暗杀来解决冲突。如果没有形成完善的和平解决矛盾的机制，如果民众的利益和意愿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得到体现，政治暗杀事件就难以避免。

然而，清末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却有着与此不同的丰富内涵。

清朝末年，专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外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出卖国家主权，对内横征暴敛，血腥镇压。中国已经陷入了被列强瓜分的危机中，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挽救日益严重的民族危亡，为了拯救民众于水火，为了实现国家的强盛，一批仁人志士揭竿而起。他们十分重视暗杀手段，把政治暗杀作为武装斗争的一部分。他们认为，革命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宣传，二是起义，三是暗杀。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并行，暗杀可以推进革命高潮的到来，革命高潮的到来必须辅以暗杀的手段。尤其是当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屡遭挫败之后，他们更想孤注一掷，用暗杀手段直捣清政府的老巢，推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样，政治暗杀便应运而生，暗杀风潮弥漫于清末社会。

清末民初的政治暗杀，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当政者对异己的暗杀，二是在野的革命者对统治者的暗杀，三是外国势力对中国政治人物的暗杀。而辛亥革命之前，基本上只有革命党人从事的政治暗杀，清政府觉得判定有罪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要捕要杀完全可以公开进行，故较少采用暗杀手段。反清排满的革命党人没有公开生杀予夺的大权，只好采取暗杀方式解决问题。

政治暗杀，是清末革命党人反清革命的一种特殊方式。

暗杀作为暴力革命的一种表达方式，在辛亥革命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据初步统计，清末总共发生了50多起暗杀事件，其中比较重大者达19次之多。如1900年史坚如谋刺两广总督德寿、1905年吴樾刺杀出洋的五大臣、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0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良弼等等。

清末革命党人暗杀风潮的规模之大，暗杀事件之多，暗杀手段之多样，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它不仅对于推翻专制腐败的大清王朝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直到民国初年仍然成为影响时局发展的重要内容，如宋教仁被刺案、陶成章被刺案、陈其美被刺案、廖仲恺被刺案等等。因此，政治暗杀，是辛亥

革命中不可忽视的历史内容，是一份很值得后人玩味的宝贵遗产。

在人们的印象中，暴力暗杀是恐怖行为，是草莽武夫之所为。而辛亥时期慷慨赴死的革命义士，则多为官宦少年和富家子弟，或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热血青年。他们不是赳赳武士，而是羸弱文士，是接受了近代民主共和观念的知识分子，甚至很多是接受过海外教育的留洋学生。因此，当时从事暗杀活动者，并不是一般的社会底层贫民，更不是为金钱地位所收买的职业刺客，而是出身于良家的大好热血青年。他们从事暗杀的目的，是为了促成革命，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

清末参与暗杀的革命党人，是20世纪中国的风云人物。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吴樾、陈独秀、汪精卫、徐锡麟、秋瑾、赵声、仇鳌、陈其美、陈炯明、刘师复、俞培伦、温生才、李沛基、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彭家珍等等，都曾经参与到清末暗杀风潮中。这些革命党人组建了许多专职暗杀的团体，策划了一起起震惊中外的刺杀事件。

清末革命党人之所以要进行暗杀活动，并不是由于他们与刺杀对象之间有什么个人恩怨，更不是为了寻私仇而进行报复。他们与暗杀对象之间并无个人恩怨，甚至素不相识。他们的恐怖暗杀活动，虽然表面看来针对的是清政府的高官大吏，是要消灭专制政府统治者的肉体，但实际矛头所指向的，是封建专制政体本身。他们刺杀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封建专制政体，是为了追求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是为了追求民主、共和、宪政与人权的高远革命理想。

正因如此，清末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恐怖主义，更不是一般人的个人作为。暗杀者的身份不是所谓暴民，而是追求民主、人权、宪政的革命者，是甘愿为民主共和而“敢以颈血溅诸侯”的英烈义士。这些暗杀者，是一群怀抱救国救民之志的革命理想主义者，是一群将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的仁人志士。

他们，堪称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坚强脊梁。

清末革命党的暗杀活动，具有鲜明的历史烙印。他们倾慕司马迁笔下的豫让、聂政等人，但又摒弃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私人恩怨。他们明白表示，他们所进行的暗杀，目的是为了“宏大汉之声”，是为了“种族之恩，祖国之恩”，是“为民请命”。他们在继承了中国传统侠客敢于牺牲，不畏强暴，一往无前的豪侠精神的同时，还力倡勇敢之风，力提矢志不渝之气。

舍生忘死，玉石俱焚，我以我血荐轩辕。革命党人慷慨赴死，毫不畏惧，用自己的鲜血浇铸了中华民族之魂。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慷慨赴死，有着像吴越这样坚定的理念：与其奴隶以生，不如不奴隶而死！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少数英豪血淋淋的人头，化作广大民众的指路明灯，引导和推动着反清革命运动。

革命党人用炸弹、匕首、子弹，惊醒了沉睡的国人，动员他们投入反清革命的时代洪流中。

清末革命义士的暗杀主义，乃中国古代游侠刺客精神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暗杀活动的结晶，是典型的“中西合璧”的产物。

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复杂多样，但其暗杀思想却大致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欧洲尤其是俄国传来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二是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的尚侠、尚勇之刺客传统。

清末革命党人多为留学日本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日本接触到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阅读了不少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品，对“虚无党”、“民粹党”刺杀俄国沙皇英勇事迹钦佩不已，并加以仿效，加以崇拜，逐渐产生了以个人暗杀方式推进武装起义、革命排满的思路。

《史记·游侠列传》对中国古代游侠描述道：“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每到历史的大转折时期，游侠都踊跃参与着革故鼎新的主流政治活动。革命党人从中国传统游侠身上看到了民间正义力量的存在，对荆轲、专诸式的刺客加以推崇。在清末革命党内部，以任侠敢死的精神勇于实践者，几乎成为普遍风气。这些矢志于暗杀的革命志士也以游侠相称，如吴越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孟侠，秋瑾自号“鉴湖女侠”等，他们的理念便是“誓捐一死，以少尽力于我同类，而剪除一仇敌”，古代的荆轲、聂政也都成了他们的精神尊崇对象。

1903年，壮游以山海、军人、游侠、社会、魔鬼五魂写成《国民新灵魂》一文说：“共和主义、革命主义、流血主义、暗杀主义，非有游侠主义不能担负之。”他们以游侠精神为其他革命手段的人格支柱。许多革命党人，正是以这样的游侠精神参与到推翻专制政府的反满革命斗争之中。

对于清末革命党人的刺杀活动，有人将其与中国古代侠客行为进行了比较，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其云：

“自贯高、赵午之后，寡闻刺客之事。盖怀柔者中央所倡，游侠者中央所禁也。清末刺客忽炽，非满汉之争愈烈，革命之意愈迫，亦兵器之工日精，思想之学日新也。而近之刺客与古也不同。东周义士，太史公以为主意较然，不欺其志者也，然或养士以报，或一饭不忘，古诗云：‘惭无灵辄，以报赵宣’者也。如荆轲者卫国人，安得有报燕之志哉？而王僚、阖闾，又安得有优劣之辨乎？惟今孟侠、兆铭、家珍、锡麟等，为国家民族故，视头颅如巾栉，虽私惠而未敢忘，真国士也，比古之四大刺客，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其炸弹横飞之时，满清贵胄人人自危，终至心碎胆寒，愿作富家翁，而不愿苟延社稷。故不久清室旋亡，刺客之力十之二三也，于其人则彭家珍，于其地则广州最可彰见也。后人不知此，故孟侠铜像不立，良以悯哉！”

中国传统的游侠精神与俄国无政府主义之完美结合，造就了革命党人充满血性的个人英雄主义乃至恐怖主义。中国游侠与俄国刺客的完美结合，成就了清末革命运动中英勇无畏、慷慨赴死的革命烈士。

“孔曰成仁，孟曰成义”，以手枪、炸弹等铁血手段对抗专制残暴的大清皇朝，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以最极端的暴烈方式，表达对封建专制政府的愤怒，成为革命党人强大的内在精神动力。

目 录 Contents

导言	1
第一章 清末暗杀风潮之先声	
一、史坚如两番刺德寿	1
二、万福华刺杀王之春	13
三、横滨暗杀团谋刺铁良	25
四、王汉北上刺铁良	31
第二章 暗杀时代的到来	
一、杨笃生在上海扩大暗杀组织	38
二、秘密成立北方暗杀团	43
三、吴樾血溅五大臣	50
四、暗杀时代之到来	58
五、推崇虚无党的恐怖暗杀	63
六、韩衍鼓吹“弹丸政治”论	69
第三章 光复会的暗杀活动	
一、以暗杀为主旨的秘密团体	73
二、徐锡麟连发七弹杀恩铭	81
三、鉴湖女侠慷慨赴义	98

四、王金发的刺杀义举	107
------------	-----

第四章 未遂的刺杀密谋

一、梁铁君谋刺慈禧太后	113
二、掀起反清革命高潮	118
三、杨卓林谋刺两江总督端方	125
四、孙毓筠再次谋划刺杀端方	132

第五章 同盟会掀起暗杀高潮

一、汪精卫义愤北上	140
二、刺杀摄政王	150
三、慷慨歌燕市	158

第六章 暗杀风潮的持续高涨

一、恐怖的支那暗杀团	168
二、温生才刺杀孚琦	174
三、林冠慈刺伤李准	185
四、李沛基炸死凤山	194

第七章 平津同盟会的暗杀

一、张先培刺杀袁世凯	202
二、彭家珍冒名杀良弼	209

结语 革命党暗杀行动的震慑力

主要参考资料	224
--------	-----

第一章 清末暗杀风潮之先声

一、史坚如两番刺德寿

政治暗杀是暴力革命的特殊表达方式。清末的政治暗杀，不是从革命党人开始的。1870年发生的张文祥刺马案，堪称晚清最为著名的政治暗杀案。但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已经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仇杀，也不是政治势力间的权谋角斗，而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正义的反清斗争。

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风潮，是从1900年史坚如刺杀两广总督德寿开始的。爆炸总督衙门，谋刺德寿，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组织的第一次暗杀行动。这次暗杀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一位体弱多病、举止文静的年轻后生被清廷爪牙捕获。

他，就是谋刺两广总督德寿的革命党人史坚如。

史坚如（1879—1900），原名文纬，字经如，后改为坚如，原籍浙江绍兴，1879年出生于广东番禺一个官僚家庭，相传为明末抗清殉国的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后裔。他的曾祖父史善长，祖父史澄，父亲史悠乾，均以读书而致仕，家庭较为富足。

6岁时，他的父亲病逝，由母亲抚养成人。其母端严静默，贤而知书，常鼓励他们兄弟姐妹好好读书，知书达礼，继承诗书人家的传统。其兄古愚，其妹憬然，发愤向学。

史坚如自幼体弱多病，默寡言笑，显得不太合群。他稍长入私塾读书，不喜欢八股文章，却喜读史书，善作书画，尤好研究古今成败的原因和中外兵家战略，用了很大精力研究西政、西艺、兵法、舆地诸学等所谓西洋新学。

常言道，幼而孤者，不成精神病人，就为奇士雄才。史坚如年幼之时已显露出奇士潜质。史坚如面目清秀，胆子豪放，性格刚烈，做事坚毅。虽貌似文

弱书生，却暗藏激昂壮怀。他深慕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英雄所为，崇拜历史上的英雄豪杰，忧国怜民，疾恶如仇。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丧权辱国，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年仅16岁的史坚如闻讯，悲愤异常。他与友人议论时局，说道：“大厦覆矣，谁尸其咎？某血性男子，乃肯戴民贼以取亡乎？吾将行吾志矣。”他认为，“民主为天下公理，君主专制必不能治。”

他对同学们大声疾呼：“今日中国，恰似千年破屋，败坏至极，不可收拾。不尽毁而更新之，不能救中国！”

从此时起，史坚如忽忽如狂，终日走马习武，甚至延请日本武士教他击剑，以增强体魄。史坚如虽然生长在一个钟鼎荣华的官僚家庭，但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毅然不做膏粱子弟，逐渐萌发了救国救民的反抗意识。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人被杀消息传来，史坚如更加悲愤，深感清廷昏庸无望，进而燃起了对满洲贵族的强烈仇恨，革命思想由此而生。他大骂发动戊戌政变的慈禧太后道：此老妇真是可杀！遂联络好友，准备大举起事。

不久，史坚如进入美国人所开的广州格致书院读书。在这所传授西学为主的教会学校中，他受到西学的启蒙和熏染。他接受了物理、化学、天文、地理、数学等近代科学知识，并结识了许多与自己年纪相仿的热血青年。他们以革命、流血、救世之说相策励，深感“吾道不孤，吾志可行”。

正是在格致书院时，史坚如了解了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坚定了投身革命的信念。

史坚如虽年幼丧父，其家却是当地富室，田产房屋很多。为了赞助革命，史坚如想以低价尽售家中土地房屋。最终，却因价钱过低而无人问津。对此，乡邻们窃议：史家根本不缺钱，如此低价售卖产业，难道其中有诈！居然没有人敢购买。

1899年，史坚如和兄妹劝说其母离开广东迁往澳门，并变卖了部分家产，用以资助、交结各方会党及革命人士。他奔走于江南各地，四处联络，“不数月间，自珠江以至长江一带的会党首领，几乎莫不相识”。他的同学胡心泉此时还愿意继续回广州格致书院读书，史坚如厉声劝道：“国事急矣！安尚有时日待你毕业？今日吾辈唯有牺牲为国做破坏工作，将来建设可待他人。”

胡心泉被其感动，追随史坚如四处进行革命活动。

1899年，史坚如在广州结识了“东亚同文会”广东支会的负责人、日本人高桥谦。两人一见如故，欢谈良久。通过高桥谦，史坚如获悉了孙中山等人在海外的革命活动，就欲东渡日本，拜会孙中山。1899年9月，史坚如还认识了日本浪人宫崎滔天，证实了孙中山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的情况，更坚定了赴日的决心。

史坚如怕母亲和哥哥阻拦，便动员宫崎滔天出面劝说，以赴日留学为名，瞒住家庭，积极筹划赴日事宜。

宫崎滔天（1871—1922），本名宫崎寅藏，是一位毕生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日本浪人。他早年就学于东京专门学校（今早稻田大学）英语科。1892年，他第一次西渡中国，被友人日下部正一骗去旅费，困于上海囊中羞涩，遂作罢回国。1897年5月，他结识了革命党人陈少白，随后到香港、澳门等地，得知孙中山抵日，立即回到日本东京，与孙中山会面。他倾心于孙中山的革命计划，决心支持其革命活动。随后，他将孙中山介绍给犬养毅，并常伴在孙中山左右，参与到中国革命之中。

1899年9月，宫崎滔天参与促成哥老会、三合会和兴中会之间的合作，在香港结识未满20岁的史坚如，非常惊叹其革命理论与决心，动员他赴日本会见孙中山，商讨反满革命计划。在赴日本之前，史坚如先到了香港，会见了“革命四大寇”之一的陈少白。

陈少白（1869—1934），原名闻韶，号夔石，广东江门市海镇南华里人。他6岁入私塾，天资聪敏，勤勉好学，习字、念书、学写诗文，均是同窗中的佼佼者。1888年，美国教会哈巴牧师开办的广州格致书院开始招生，陈少白第一个报考，并被录取入学。读书期间，他的三叔陈麦南常携多种西文译本给他阅读。陈少白从中看到世界局势的变化，并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的启蒙。他常与人说：“革命思想，多得于季父。”21岁时，他进入香港西医书院读书，与孙中山、尤列和杨鹤龄被称为“四大寇”，共同从事革命活动。

1895年，陈少白加入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参与在香港创设兴中会总部，研究攻取广州计划。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辗转英、日、新加坡、越南和香港、澳门等地，宣传革命，筹措经费，辅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

陈少白在香港见到史坚如后，为史坚如的革命热情所感动，立即介绍他加入了兴中会。史坚如誓以身殉反清革命，成为一名民主革命的先驱战士。他认为，“要想实现所谓真正的改良，只有用鲜血来洗涤人心一个办法”，决心追

随孙中山以实现革命大志。陈少白建议他到长江流域游历，见见世面，然后再去日本见孙中山。

史坚如接受了陈少白的建议，先到上海、湖北等地游历，与同志畅议天下形势，为日后的起事做精神和物质准备。

1899年底，宫崎滔天、陈少白与史坚如转道上海，以留学为名东渡日本，到东京会见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1866—1925)，乳名帝象，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化名中山樵，广东香山（中山市）翠亨村人。他自幼向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曾以“洪秀全第二”自称。1879年，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当时他的长兄孙眉为该地华侨资本家，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1884年的中法战争，激起了孙中山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热情。他目睹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开始产生反清革命思想，经常发表反清言论，同时与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何启、郑观应等有所交往。1886年，他自中央书院毕业后入美基督教长老会在广州开办的博济医院附设医校，次年转到香港西医书院继续深造。在香港读书期间，他经常往来于广州、澳门和香港等地，广泛结交朋友，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经常“商谈造反覆满，兴高采烈”，被人称为“四大寇”。

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一面行医，一面联络有志之士，准备创立革命团体。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未被接受。

1894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再次赴檀香山，创建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次年2月，他联合香港爱国知识分子的组织辅仁文社，建立香港兴中会。同年10月，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1896年10月，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诱捕，经英国友人营救脱险。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初步形成了三民主义思想。1897年，孙中山由英国经加拿大转赴日本，结交了宫崎滔天、犬养毅等朝野人士，宣传革命思想，联络各地反清志士。

史坚如与孙中山在日本会面后，一见倾心，相谈甚欢，前后畅谈了十多天。他们有时谈得兴趣高昂，就从白天一直谈到深夜。在孙中山劝说下，史坚

如放弃了在日本留学的计划，回国策划反清革命。史坚如慷慨地说：“天下多事，不是我辈安坐的时候！”便与孙中山握手告别，奉孙中山之命从日本回国，负责联络长江一带会党。

对于这位翩翩美少年，孙中山嗟讶不已。他认定史坚如是一位“命世之英才”。

1900年春，史坚如冲破母亲的阻拦，离开澳门到香港，协助陈少白创办《中国日报》，在理论上大力宣传反清革命，将中国日报社变成了策划反清武装起义的大本营。

1900年夏秋间，清政府利用义和团，实行愚昧的排外政策，结果引起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携光绪帝逃往西安，北方陷入无政府状态。保皇党利用唐才常的势力，谋在长江流域起兵勤王，中部各省也风声鹤唳。孙中山决定乘机，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

1900年7月17日，孙中山乘法国轮船“烟狄斯号”到香港，因香港政府对孙中山驱逐五年令未到期，不准他登岸。这样，孙中山便召集郑士良、陈少白、史坚如、李纪堂等人在船上商议再举起义的计划。

孙中山决定利用义和团运动之特定时机，命郑士良等人往惠州联络会党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得手后向福建沿海进军；孙中山坐镇台湾供给饷械；杨衢云和陈少白留香港接应；史坚如和邓荫南到广州部署起义，其目的不是夺取广州，而是想在惠州起义时牵制清军，并组织暗杀清廷在广州的军政大员，以资策应。

史坚如接受孙中山的命令之后，立即动身来到广州。他亲自前往东、西、北三江，联络当地绿林会党首领区新、马王海等部，还策反了防营汉旗练达成部，共汇集各路人马数千人，拟订了攻打广州的日期。

为了筹集武装起义所需经费，史坚如四出张罗，所得无几，难济于事。于是，他和哥哥史古愚“拟尽售三万金之家产，以充军费”，但因战乱兵荒，只卖出了一所房子，获得现金3000元，起义所需款项仍然未能筹集够。加上孙中山原来约定提供给广州方面的军械未能按时运到，原定的广州起义计划被迫延期。

正当史坚如在广州紧张筹备起义之时，郑士良负责的惠州方面首先发难。

郑士良（1863—1901），号弼臣，广东归善（今惠阳县）人。少有大志，跟随乡中父老习武，结识不少会党人物。青年时至广州入德国传教士所办礼贤

学校就读。1886年入广州博济医院学医，与孙中山同学，对其革命主张十分折服，向孙中山表示自己是会党中人，日后可发动会党参加反清起义。1893年，他与孙中山等人参加了在广州南园广雅抗风轩的聚会，议论组建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的团体。1895年，他从澳门赴香港协助孙中山建立兴中会总部。广州起义计划失败后，他与孙等东渡日本，不久又奉孙中山之命回国联络会党。1899年参与组建兴汉会，推举孙中山为会长。

1900年，郑士良奉孙中山之命，到广东惠州发动起义。他选择广东惠州归善县三洲田作为根据地，准备起义。三洲田是会党啸聚之区，三合会深入于周围农村之中，集中了600名精壮骨干，但因武器弹药不足，军粮又日渐匮乏，只好将所部分散，仅留80人守大寨。可是风声已传出，两广总督德寿派兵对三洲田进行包围，郑士良急电孙中山请速接济。孙中山复电称，筹备未竣，暂时解散。郑士良再电孙中山，仍请设法迅速接济弹药。孙中山再复电：“若能突出，可直越厦门，至此即有接济。”

此时，清军已经逼近三洲田，郑士良被迫率众提前发动起义。

10月6日晚，黄福率80人夜袭清军，斩获40人，生擒30余人，初战告捷。黄福拟于天明时乘胜追击，但郑士良按照孙中山的命令全军改道，往厦门前进，并接替黄福的指挥职务。15日，起义军攻占平山，夺得大批枪支弹药，同时，梁慕光等也在博罗响应，千余人直扑博罗城。17日，起义军在永湖与清军再战告捷，20日，在崩冈墟又告捷，人马扩大到2万多人。

孙中山一面致电宫崎滔天，令其将向菲律宾借定的枪支速运往惠州；一面与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接洽，请协助供应武器弹药。但是，日本新任首相伊藤博文禁止台湾总督帮助革命党人，儿玉源太郎奉命扣押了革命党人存贮在台湾的军火。这样，孙中山没有武器接济起义军，起义军缺乏枪支弹药，陷入危境。

郑士良率领的起义军终因弹尽粮绝，无法行动，被迫解散。郑士良、黄福、梁慕光、黄耀廷等数百人，先后抵达香港。

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但给革命党人以极大的鼓励。孙中山后来回忆道：“广州、惠州两次起义，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出走，议和赔款四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再回头来说广州方面。

两广总督德寿闻知郑士良发动惠州起义，非常惊慌。他急忙调派大队清军前去弹压，郑士良的惠州起义军处境危急，最终失败。但在起义军与清军进行激战之时，在广州负责策应任务的史坚如等人并没有停止革命活动。为了打乱清军的部署，瓦解清军军心，鼓舞革命党人与起义军的士气，他们力图在广州举事响应，但苦于军械缺乏、准备不足，屡不成事。为此，史坚如提议暗杀清廷在广州的三位军政大员，然后再联合会党趁乱攻占广州，以此来接应惠州起义。

史坚如对革命党人邓荫南说：“如果杀了粤之渠魁，广州必乱，其中枢无主，我师必宽，各路起义部队必然得心应手。粤省一定，即可出师北向。”

史坚如的暗杀计划，得到了邓荫南的赞同与支持。

邓荫南（1846—1923），原名松盛，字有相、荫南，排行三，又称邓三，广东开平人，开平公学堂及檀香山华文学院肄业。他早年到檀香山谋生，后经营农场和蔗园，成为当地的富商。他性情慷慨，乐于助人，深得华侨和当地土人敬重，与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交往甚密。1894年与孙中山见面后，就加入兴中会，被推为值理。次年，他变卖家财充革命经费，回国参与筹划广州起义。失败后，他避居澳门。1898年，他与宫崎寅藏等人在广州设立东亚同文会，作为继续开展革命活动的掩护，并筹措款项，协助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宣传反清革命。1900年，邓荫南与史坚如在广州策应惠州起义，被委为广州方面民军总司令。

邓荫南与史坚如等人决定：黄福负责去炸广州将军衙门，李植生去炸陆军提督郑润材，史坚如亲自去炸两广总督德寿。这三大员是清政府在广州的三个最高军事负责人，而两广总督德寿显然最为重要。因此，史坚如暗杀德寿的任务，就显得特别艰巨。

两广总督德寿，原为广东巡抚，因为两广总督李鸿章北上，他署理两广总督兼任广东巡抚，是广东地方的头号军政人物。德寿署理两广总督后，觉得广东巡抚衙门的警卫和围墙比两广总督署可靠，所以仍旧住在广东巡抚衙门后面的官邸里，并没有搬到两广总督署去住，而且在巡抚衙门加强了警戒。由于广东巡抚衙门戒备森严，史坚如等革命党人很难下手。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惠州一带发动武装起义，广州城里已是风声鹤唳，人心动摇。德寿知道自己是革命党人暗杀的首要目标，如惊弓之鸟，深居